

# 华人参政与印尼政治文化革新\*

(印尼) 许天堂 著 龙力 译

[关键词] 印尼; 华人参政; 政治文化

[摘要] 本文首先叙述了苏哈托统治时期, 印尼华人在政治生活和文化心理上所受到的沉重打击, 然后对“五月骚乱”后印尼华人的参政情况作了介绍。文章还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印尼华人对政治生活不够积极的原因, 其内因是印尼华人结构复杂, 没有形成统一的族群意识, 其外因是印尼政治仍有歧视华人倾向, 印尼政治文化有待革新。

[中图分类号] D73.37.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4)02-0014-04

由于“新秩序”集团实行压制、歧视和裙带政策, 印尼大众形成一种陈见, 认为华族都是极端自私的经济动物, 全然不顾印尼人民和民族的命运。这种陈见其实是故意给华族烙上的恶名。另一个有效迫使华族回避政治领域的烙印就是“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

在扑灭印尼共的“九三〇事件”时期, “新秩序”军人集团以“印尼国籍协商会”/印尼共为罪名, 压制性地逮捕、审判华族组织人士、活动家、干部和成员, 解散各种带有华人意味的组织、团体和基金会, 没收华人和“印尼国籍协商会”开办的学校, 将之作为军队宿舍或国立学校, 更有甚者, 把它变为将军住宅或改作店铺、商业中心。<sup>[1]</sup>

苏哈托军人集团进行的排华活动实际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遏制北方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的论调彼此呼应。从一开始, 他们就极力进行各种排华反中活动, 以转移印尼人民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的注意力; 不遗余力地进行排华反中宣传, 说什么印尼民族的真正敌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 印尼华人是中国的第五纵队, 藉此扭曲印尼人民的观念。<sup>[2]</sup>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正达到高潮。

当时, “民族统一促进会”(LPKB)将“九三〇事件”视为挤压政治对手的起点, 极力玩弄手腕, 欲将“印尼国籍协商会”当作替罪羊, 上窜下跳, 四处鼓噪将其解散。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的策划, “印尼国籍协商会”从一开始就被诬

陷为印尼共。一时间, 凡经陆军过滤过的印尼传媒在重新出版时, 便集中火力, 群起进行排华反中宣传。“印尼国籍协商会”负责人和华界名流遭到缉捕和敲诈, 成百上千名华人成为屠杀的受害者。同时, 针对华人颁布了各种禁令, 禁止华人在公开场合庆祝传统节日, 禁止华人尊崇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 禁止使用汉字、汉语。最刺伤要害的是强令将“中华/中国”的称谓改为歧视性的“支那”。使用“支那”一词给华人造成致命伤痛, 使华人在政治和心理上无能为力。这些构成了一种持续性的困境, 成为“新秩序”时期华人尽可能回避政治领域的主要原因。至今, 苏哈托集团倒台5年多了, 但大部分华族仍郁积一种情绪, 不愿投身现实政治。

然而, 苏哈托总统有一种本能, 即仿效爪哇国王和荷兰殖民者为自己敛财。这促使他在华族中豢养了一小撮密友, 通过贪污、勾结和裙带关系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摇钱树。不幸的是, 这一小撮华人忘乎所以, 忘记伦理道德和良知, 使自己暴富, 从而导致广大公众产生消极看法, 认为所有华族都贪污, 都是贪婪的“经济动物”。

此外, 苏哈托十分务实, 他重用所谓“伯克利黑帮”(Mafia Berkeley - 系指受过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教育的几位经济学家, 以维佐约·尼蒂萨斯特罗为首, 包括阿里·瓦达纳、埃米尔·萨利姆、默哈马德·沙德利、苏布罗托等5人组成的经济顾问小组一译注), 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援助,

[收稿日期] 2004-03-03

[作者简介] 许天堂, 印尼华裔学者; 龙力, 本刊特约撰稿人。

\* 此文系作者2004年1月13日在雅加达关于“印尼2004年政治经济前景: 走向复苏的努力”研讨会上的发言。

成立“援助印尼国际财团”(IGGI),利用那些有实际经商经验并在亚洲建立了商业网络的华人,促进了印尼实体经济。华族则被局限于经商,无法涉足其他领域,当局或明令或暗示(如恐吓)禁止华族参政,并为华人成为国家公务员或参军设置重重障碍。

“新秩序”集团这种政策实行了三十多年,华族逐渐远离政治,致力于经商。这就是“新秩序”政府创造的氛围,诱导社会上形成一种看法,认为华族通过将一切非法手段合法化来敛财聚富,图谋私利。事实上,几百年来,在印尼历史发展进程中,华族在政治、社会文化、新闻、文学、体育、外交领域,甚至在驱逐荷兰人的武装斗争和抗日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sup>[3]</sup>

### “新秩序”集团之后华族的政治作用

1998年5月13-15日发生的悲剧震撼了印尼全体华族,催发了意识觉醒,使他们认识到长期以来自己被边缘化却又无力抗争。公民权绝大部分被阉割,与印尼共一道被当作替罪羊和统治者敲诈勒索的对象,民族、种族甚至做人的尊严遭到践踏。“新秩序”统治者给他们的唯一自由就是经商。的确,这提高了他们家庭的生活、教育水平,但没有政治自由,一切都毫无意义。1998年5月13-15日的事件证明,华族即使在经济领域再神气,没有政治实力,几小时之内其力量就会荡然无存。

“新秩序”集团一倒台,各种以华人为基础的组织和政党纷纷脱颖而出。1998年5月13-15日事件和苏哈托集团的倒台是华族觉醒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全体印尼人民在争取正义和民主斗争中觉醒的一部分。这种觉醒多是自发性的、激情洋溢的,缺少政治和组织经验,缺乏深孚众望、凝聚民心的领导人,各色各样的组织是打着民主改革的旗号走上前台的。

1999年大选,仅有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印尼大同党)通过全国大选委员会筛选,参加了大选。该党创立者和领导层对得票的预估大大失算。他们预计这个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定能得到人数近一千万华族的支持,稳获5-10个议席。结果却是该党仅在西加里曼丹选区夺得一个议席,L.T.苏珊托(L.T.Susanto,林冠玉一译注)当选议员。

仅凭区区一个议席,他是否就能为印尼全体华人的意愿和利益而奋斗?1999年大选结果,确有

几个华人当上议员。除L.T.苏珊托(林冠玉)外,其中还有阿尔芬·李(Alvin Lie,李宁彪一译注,国家使命党)、詹德拉·维贾亚(Tjandra Wijiaya,民主斗争党)和恩加尔迪亚索·鲁基塔(Enggartiaso Lukita,专业集团)。除阿尔芬·李(李宁彪)敢于直言外,几乎听不到其他议员的声音。但阿尔芬·李(李宁彪)是否在议会中积极为反映华族意愿而奋斗,这有待证明。

1999年产生的国会开始运作以来,埃斯特·英达亚妮·尤素福(Ester Indahyani Yusuf)领导的“民族国家团结促进会”(SNB)曾协调各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向议会各党团递交各种反歧视建议、请愿或提案。议会里那些华人朋友是否也曾为此而力争?他们是否在各自党团内外游说,以便将那些建议提交议会大会讨论?

古斯·杜尔(即瓦希德一译注)执政时期,郭建义被任命为经济统筹部长,这是一个令全体华族感到骄傲的要职。“新秩序”政府统治32年间,仅一位华族被破天荒任命为部长,即默哈马德·波卜·哈桑(Mohamad Bob Hasan),又叫郑建盛(The Kian Seng)。这也只是在“新秩序”倒台前两个月。印尼全体人民本寄望郭建义能使印尼经济迅速改观,可惜却因郭本人与瓦希德总统发生冲突而未能实现。如今在梅加瓦蒂政府中,郭建义担任建设国务部长兼国家建设计划主任,但在工作中,他与其他主管经济的部长们时常意见相左,想法不一致,这使他常常处境尴尬,似乎“无所作为”,几近默默无闻。

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从诞生那天起,就可预见其受挫的命运。因为华族并非单纯族群,政治利益参差不齐。加上这些政党多是突然出世,准备工作仓促。一个政党应具备合法而清晰的政治理念、使命、纲领和计划,具有团结一致、德高望重、高度统一的领导集体。而那些处于初创、分化的政党很难得到圈外人支持。指望华人企业家和财团支持来发展政党几乎是画饼充饥。企业家们自有考量,他们只支持那些有胜算把握的政党,以便其商业利益得到保护。

1999年大选中,大部分华族选择其他政党,一般都选择支持象征着受压迫阶层的印尼民主斗争党(PDIP)。有些选择国家使命党(PAN)(中爪哇、日惹和北苏门答腊华人)、民族觉醒党(PKB)(东爪哇华人)、专业集团(支持现状的一些企业

家)和民族关爱民主党(PDKB)(基督教/天主教团体)。

除政党外,各种非政府组织、联谊会、协会、社团和基金会在后苏哈托时代纷纷冒头,以不同观念和使命把华人拢在一起。但这些大都是社会文化组织,带有家族宗亲色彩,极力回避政治。

另有不少华人学者、大学生和青年积极投身各种不以华人为基础的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与其他社会活动家打成一片,为推进印尼人民梦想的改革而奋斗。这些人多为“侨生”,例如担任全国法律委员会(KHN)成员的弗兰斯·亨德拉·维纳达(Frans Hendra Winarta,陈显伟一译注)、担任全国人权委员会成员的詹德拉·塞迪亚万(Chandra Setiawan,黄金泉一译注)、信息流研究所(ISAI)的斯坦利、民族国家团结促进会的埃斯特·I·尤素福和雅加达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人苏尔雅·詹德拉(Surya Chandra),还有活跃在行业组织中的安东·苏比特和苏达梅克AWS。在后苏哈托时代,还出现不少政治、经济、社会观察家,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文章、各抒己见。在新闻界,许多年轻记者活跃在文字和电子传媒领域。

同“新秩序”政府时期相比,华族政治生活大有进步,可以自由谈论政治问题和民族命运,积极参加各种研讨会,包括印尼华裔总会(INTI)主办的讨论会。如果说起初他们只是洗耳恭听或遮遮掩掩地就华人问题发问,那么如今他们是争先恐后就我们民族面临的问题大胆质问、畅所欲言。

面对2004年大选,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全面受挫。没有一个通过司法和人权部规定的条件和人大选委员会(KPU)的资格甄别,因而无权参加大选。数千名同情者和干部几个月来拼命工作、到处筹资,摩拳擦掌准备参加2004年大选,到头来大失所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党的领导人毫无责任感,很快就跳槽去当其他党的候选人,使其干部和同情者空留困惑和沮丧。据几家华文报纸研究,参选各政党中有92名国会议员候选人是华族,这还不包括地方议会候选人。不知政党招募他们是去拉选票(vote getter)还是去筹资,但这起码证明华族政治生活有了进步。此外,全印尼还有数百名华人登记参加地方代表会议(DPD)选举。

### 华人政治势力图

多年来,公众的印象是,由于面对新秩序政府

的不公正待遇,华族心齐抱团。事实并非如此。华族不仅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就连社会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经商行业也是多种多样。但公众却存在误解,习惯把华人中一小撮坏人的劣迹扩大化为整个华族的过错和品质问题。

华族大体上可分为“纯血统”和“侨生”。“纯血统”华族生于中国,子孙后代有浓厚乡情,一般都固守传统文化和信仰,能说流利的普通话或家乡话。而“侨生”的祖先几百年前已来到印尼,由于当初不允许携妻闯荡,他们便娶当地女子为妻,文化上融于当地,艺术、服饰、语言、宗教信仰上造就了一种混合型文化。他们不会说普通话或家乡话,由于同中国断了联系而没有家乡观念,多数人甚至不知家乡在何处。

“纯血统”也并非完全相同,而是按家乡分为不同群体,有的来自福建,有的来自广东、山东、湖北等省。即使福建又分为厦门、福州、福清、兴化等地,广东分为梅县、大埔、潮州、广州等地。他们政治观点各异,有的向着中国大陆,有的向着台湾。如果按印尼地域划分,他们又被贴上消极标签,分为棉兰支那人、爪哇支那人、邦加支那人、坤甸支那人。

从行业来看,可分为:福清人多从事金融(银行)和纺织业,兴化人经营汽车等交通工具,福建人(疑为福州人一译注)做土产和咸鱼生意,客家人开杂货店,孔府人经营餐馆、家具店和照相馆,湖北人当牙医或经营牙科器械。如果我们去芒加杜瓦(Mangga Dua),可以看到摆摊的多是客家人,现代照相馆(Modern Foto)主人是广府(广东一译注)人,大田(Sawah Besar)的零部件供应商是兴化人,小门(Pintu Kecil)的企业家是福清人。

“纯血统”是否抱团,其实未必。他们除在生意上竞争外,还有浓厚的家乡观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按照家乡划分竞相成立各种组织的原因。客家人与福建人隔阂深,双方头面人物谁也不服谁,竞争很激烈。

“纯血统”的社团组织一般都是初级的、长尊幼卑的、传统的,在确定领导人时多推选与当局关系好的成功企业家,因为作为外来侨民,他们只能靠那些生意成功又与统治者近乎的企业家来获得安全感。

“侨生”一般由中下层组成,按居住环境四分五裂。他们已融入当地社会,不经商,多数在私企

或外企打工,开咨询公司、当律师、公证员、教师、艺术工作者、设计师、非政府组织人士等。他们感觉自己完全是印尼人,与祖居国没有牵挂。

“侨生”的政治观点与其他印尼民族无异,多样性十分突出。他们凭借良知选择不同政党,表达各自政治意愿。这就是为什么“侨生”几乎没有成立华人政党念头的原由。与一位客家人士成立印尼大同党形成对照的是,几位侨生人士参与成立国家使命党和其他政党。

面对2004年大选,华族自然会成为各政党争夺的“俏佳人”。1000万华族<sup>[4]</sup>对获得大选资金和选票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这些政党负责人没有料到,华族从1999年大选中学会了许多东西,并且已经明白不能轻易把意愿和命运寄托给那些在竞选时说得天花乱坠的政党。如“副总统中心”(Wapres Center)的倡议者和创办人完全没有料到,他们筹款(fund raising)时得不到所期待的响应。因此,我们希望那些政党从华族中招募干部和候选人时不单是冲着钱去的。

### 加快政治文化创新

毋庸置疑,华族在我国具有可以倚重的潜力。他们凭借庞大的数量,能为民族和国家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勤奋坚韧的工作精神、周密完善的营销网络;有着数百年从商经验,阅历丰富、善于捕捉商机,在亚洲商家中编织了强有力的业务网。据克里斯蒂安托·威比索诺(Christianto Wibisono)领导的“印尼商业数据中心”(PDBI)1998年的统计,印尼人在新加坡的“亚洲货币单位”(ACU)存款多达1100亿美元。如果说其中一半属华人拥有的话,这将是一个十分

惊人的数字。即使一半的钱回到印尼,我们也用不着向印尼协商集团(CG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亚行乞怜来摆脱危机。

环顾邻国,我们会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取得的成就钦佩不已。为什么这些资源贫乏的小国能领先于我们?不仅是因为它们没有“三歪风”(贪污、腐败和裙带风,KKN)和政治不稳定,而且还因为它们平等公正地对待本国所有公民,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擢任政府高官时,多凭真才实学而不是靠“三歪风”,不分三六九等。

要使国家繁荣,我们必须充分调动包括华族在内的一切潜能,因为华族是我们民族的一部分。要敞开大门,使一切有志才俊进来,带领我们朝着理想目标前进。泰国总理他信和菲律宾前总统克拉松·阿基诺是华裔。马来西亚内阁中不少部长也是华裔。

要废除那些歧视性法规,使华族不再持有印尼共和国国籍证书(SBKRI)。情报统筹机构的支那问题协调部(BKMC-BAKIN)应该解散而不是停止运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消除“三歪风”不仅是口号,更要成为首要任务,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多年来为了借贷几十亿美元,我们总要低三下四,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所有条件,那么为什么要反对和推迟取消那些歧视性、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法规呢?

因此,我们希望加快印尼政治文化改革,使我们尽快走出当前危机。希望华族改变做生意的行为,不要昧着良心只图利润,而要为我们全民族的繁荣效力。希望华族为民族进步而投身生活各个领域,不要只守在生意圈里。最后,为了民族进步,让我们一起抛弃陈见、脱胎换骨吧。

### 【注释】

[1] 欲知“新秩序”政府处理华人组织及其资产包括房产、华文学校、印尼国籍协商会学校的政策以及全印尼华人组织的名字,见印尼共和国财政部预算总司编写的《处理种族排外组织问题指示》,国家财务建设局,1997年。

[2] 见鲍尔·拉斯玛和詹姆斯·奥力佛合著《英国的秘密战争》,Sutton出版社,伦敦,1999年,第7-9页。

[3] 欲知华族在印尼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见许天堂《政治漩涡中的印尼华人》,ELKASA出版社,雅加达,2003

年。

[4] 关于印尼华人数量,迄今尚无准确数字,因为从未进行过相关有效普查和研究。最近一次相关普查系荷属东印度政府在1933年进行的,表明荷属东印度的华人约为120万。因此目前所有数字都是估计,有说350万、6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2003年印尼华裔总会就该问题举办研讨会,但没有结论。

【责任编辑:邓仕超】